

“世界文学”不是文学的“世界主义”

蒋承勇

内容提要 一段时期来，中外学界出现了一种文化“世界主义”倾向，受其影响，在一定范围内，“世界文学”成了文学“世界主义”之代名词，其所指是少数经济强国的文学。然而，马克思、恩格斯、歌德等有关“世界文学”之论断告诉我们，世界文学是多民族文学相对独立基础上的多元共存，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即便是在“网络化—全球化”持续演进的将来，各民族文化也将是和而不同的多元统一体，而不是“世界主义”所期许的“强国文化”之一统天下，世界文学也不是少数经济强国之文学。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将促进多民族文学与异质文化的互渗互补，并拒斥文学与文化的“世界主义”倾向，助推世界文学向“人类审美共同体”的境界发展。

关键词 世界文学；世界主义；网络化—全球化；比较文学；人类审美共同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文学”“世界主义”成了中外学界尤其是欧美学界较为热门的话题，这与全球化浪潮的演进有直接关系。“世界文学”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对其基本内涵学界也有一定共识，但在新语境下却被不断重新阐释并赋予新的含义^①。在“网络化—全球化”背景下，文学一方面濒于“边缘化”的处境，另一方面，受一种过于狭隘的“世界主义”文化理论的影响，在一些研究者视野中，“世界文学”几乎成了西方少数经济大国和综合实力强国之文学，因而文学的民族性、本土化遭到了挤压。正如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大卫·达莫若什（David Damroch）在《世界文学有多少美国成分？》一文中所指出的，“世界文学正在快速地变化为美国集团资本主义的怪兽”^②。国内学者对此也提出了警示：“世界文学”口号的背后隐藏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单一性”企图，“强势文化对其他文化及其传统明显具有强迫性、颠覆性与取代性”^③；“世界文学”成了“‘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国家的文学’，或‘世界主要国家的文学’”^④。在这种语境下，“世界文学”几乎成了文学上的“世界主义”之代名词，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

如果“世界文学”仅仅是这种“世界主义”所期许的整合化的少数资本强国之文学的话，那么，以文学的他者性、异质性为存在与研究前提

的比较文学也就毫无立锥之地，“消亡”便是其必然归宿，若此，它也许就是全球化和“世界主义”酿就的文学领域的牺牲品。人类文学的发展果真会如此吗？这是亟待深究与澄清的重要问题。对此，我以为，回顾“世界文学”术语与观念产生及传播的历史，特别是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和歌德等关于“世界文学”的重要论断，对于我们正确把握全球化势头日显强劲的时代的文化与文学发展趋势，探究文学研究的新观念、新方法，无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何谓“世界文学的时代”？

在我国学界，一说到“世界文学”，往往首先会想到歌德，因为，虽然歌德并不是第一个使用“世界文学”这一术语的人^⑤，但他的关于“世界文学”之论断的影响，却大大超过了前人。因此，究竟谁先使用这个术语已显得无关紧要，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有必要首先分析歌德对“世界文学”的理解。

1827年，歌德在与秘书爱克曼谈话时提到了“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一词：“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说，诗的才能并不那样稀罕，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自己写过一首好诗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过说句实在话，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

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会陷入上面说的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⑥当时，歌德是在阅读了中国的传奇小说《风月好速传》等作品之后，说出上述这番长期以来被学者们广为引用的著名论断的。在歌德一生的文学评论言说中，他曾经20多次提到“世界文学”这一术语。

总体而言，歌德对“世界文学的时代”的展望，是基于国与国之间封闭、隔阂的日渐被破除，从而使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间的文化与文学交流不断成为可能而言的，其前提是诸多具有文化差异性的民族文学的存在。因此，歌德说的“世界文学的时代”的人类文学，并不是消解了民族特性与差异性的文学之大一统，而是带有不同文明与文化印记的多元化、多民族文学共生共存的联合体，是一个减少了原有的封闭与隔阂后形成的多民族异质文学的多元统一。正是在这意义上，歌德又说：“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共同财产。”^⑦因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超越民族文化价值和审美趣味的局限，为异民族的读者所接受，为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创作提供借鉴，从而促进异质文化与文学的交流。歌德说：“我们所说的世界文学是指，充满朝气并努力奋进的文学家们彼此间十分了解，并且由于爱好和集体感而觉得自己的活动应具有社会性质。”^⑧“我们想只重复这么一句：这并不是说，各个民族应该思想一致；而是说，各个民族应当相互了解，彼此理解，即使不能相互喜爱也至少能彼此容忍。”^⑨这里，歌德认为不仅仅是个体的作家在“彼此间十分了解”的基础上保持了各自独特的创作个性，而且，异民族、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也是在“彼此理解”“彼此容忍”——实际上是包容——的基础上，保持了自己独特性的同时又以其超越民族与文化的优秀个性而开放于世界文学之大花园。就当时的歌德来说，他不仅展望和预言“世界文学正在形成”，而且尤其期待“德意志人在这方面能够、也应该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并且将在这一伟大的共同事业中扮演美好的角色”^⑩。他还相信：“在未来的世界文学中，将为我们德国人保留一个光荣的席位。”^⑪此处，“共同事业”、“扮演美好的角色”

和“保留一个光荣的席位”，都意味着“世界文学的时代”的“世界文学”是一个由不同民族之文学经典组成的文学共同体，而在这个“共同体”里，以歌德自己已有的成就以及他对德国民族文学的信心与期待，德国人创造的文学经典将会独树一帜、光彩夺目，进而拥有“光荣的席位”。对此，丁国旗的分析是精当的：“各民族的文学‘经典’不过是‘世界文学’属下的一个个‘范本’，正是这些无数个‘范本’向我们展现了‘世界文学’所应该具有的存在方式。”^⑫今天看来，不仅歌德已经成为世界文学领域的经典作家，而且，德国文学也已然是世界文学大花园里的一朵鲜艳的奇葩，为世界文学的存在“范式”提供了经典的样本。歌德的“世界文学的时代”，展望的是生发于诸多异民族、异质文化的文学经典众声合唱的世界文学大家庭，那显然不是同质化、一体化、整一性的文学存在形态；歌德“世界文学设想的中心意义，首先意味着文学的国际交流和互相接受”^⑬。

二 何谓“世界的文学”？

在我国学界，比歌德“世界文学的时代”的概念更有影响力和指导意义的“世界文学”观念，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的文学”的论断。对此，我国学界的同仁已颇为了然，但是，在“网络化—全球化”的当下重提“世界文学”的话题，我们有必要重温并细辨其精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得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替代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

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⑧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性成为一种客观存在。他们上述的论断，一方面指出了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物质、经济的世界性发展总特征，指出了带有国际性质的经济运行方式使各民族、各地区和各国家的生产和消费已纳入到了世界性大格局之中，于是，那种封闭的、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宗法制和田园牧歌式的经济体制、生存方式乃至生活方式，逐步走向了边缘乃至消亡的状态；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特定时代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方式是受这个时代的物质生产方式制约的，不仅物质生产，而且包括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和艺术等社会意识形态在内，都受资本主义世界性生产的影响，这些社会意识形态乃至所隶属的一切思想、思潮和观念，都是从它们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中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性扩张与征服，不仅存在于商品交换涉及的领域，而且也涉及精神、文化领域。这意味着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也会在物质、经济的世界性扩张与征服中趋于世界化。虽然，人类精神的生产有自身的规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存在着不平衡性，但是，精神生产不可抗拒、不同程度地要受制于物质生产之大趋势的影响。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的背景下，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在经济和物质生产方式国际化强势的推动下，将形成“世界的文学”，于是“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⑨。

值得仔细辨析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讲的“世界的文学”，是在“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⑩的基础上形成的，换句话说，“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的独立存在与互补融合，是“世界的文学”产生与形成的前提。因此，在马恩的“世界文学”观念中，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世界文学”是基于文化相异的多民族文学各自保持相对独立性基础上的多元统一之文学共同体，是民族性与人类性（世界性）的辩证统一，而不是大一统、整一性的人类总体文学。这与别林斯基的观点不谋而合。别林斯基说：“只有那种既是民族性的同时又是一般人

类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民族性的；只有那种既是一般的人类的同时又是民族性的文学，才是真正人类的。”^⑪也正如美国当代著名比较文学专家大卫·达莫若什所言，世界文学是“在本民族文化以外传播的文学作品”^⑫，或如美国文学理论家弗雷泽（Matthias Freise）所言，世界文学的“核心问题是普适性与地方性的关系……世界文学的理解首先是从差异性开始的”^⑬。这些学者和理论家的论断，都从不同时代的不同立场和角度说明：世界文学不是整一化的人类文学统一体，而是诸多国家和民族文学的多元融合体。虽然国内外关于“世界文学”的理解迄今仍然是众说纷纭，但上述关于“世界文学”的基本内涵是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文学研究者们已达成的一种基本共识，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无疑更具前瞻性和普遍指导意义。

至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从文化交流与影响的角度看，“这种片面性”和“局限性”之“成为不可能”，不等于各民族文化差异性、独特性的消失，而主要是指在不同质的文化与文学彼此取长补短基础上的优化发展与演变，使既有民族性又有人类性的元素得以在交流中弘扬；也就是说，“成为不可能”或者在交流中“消失”的，是各民族文化中惰性和狭隘性意义上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元素，而不是足以彰显其独特性、优质性意义上的特色与优势元素。因此，从总体趋势看，在人类文学朝着世界文学方向发展的同时，或者说在“世界的文学”形成的同时，民族文学的个性、特色与优势会不同程度地得以保留抑或彰显而不是销蚀。不仅如此，不同的文学与文化并不存在优劣之分，而只有特色之别，有包容性与互鉴性，其生存与发展并不像自然界那样遵循自然选择的“丛林原则”。即使是面对物竞天择的自然界，人类也有责任保护和捍卫自然物种的多样性存在，“当前，有关环境恶化的全球化最可怕的问题或许是世界范围内的生物多样性的破坏”，而“人们如何看待他们的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文化背景”^⑭。因此，站在人道的高度看，人类必须维持自然生态的良性循环与发展，其间体现的是生态伦理观念。与之相仿，站在人类文学与文化存在之多样性、多元化之必然前提看，

各民族文学的特色与优势也更须得到有效尊重与保护,使其有各自生存、延续与发展的空间,其间体现的是人类文化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文化伦理观念。由是,人类文明也就不一定必然表现为“文明的冲突”,而是互补、融合、共存,世界文学也就有了多元共存的文化伦理前提。正如杜威·佛克马(Douwe W. Fokkema)所言,“世界文学的概念本身预设了一种人类拥有共同的秉赋与能力这一普适性观念”^①。

三 “世界文学”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往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文学”观的理解,一般只认为那是他们对人类文学发展趋势的预测与展望,“世界文学”仅仅是一种永远在路上的“预言”而已,实际上是无法实现和实证的,甚至是一种遥不可及的“乌托邦”^②。其实,我认为,从19世纪欧洲和西方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看,马恩的这种展望和预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以实现和验证,因而这种理论有其科学性和普遍真理性。在此,我们不妨以19世纪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文学思潮的演变为例略做阐述。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是19世纪欧洲文学中最波澜壮阔的文学思潮,也是欧洲近代文学的两座高峰。就欧洲文学或西方文学而言,“文学思潮”通常都是蔓延于多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同时,它必然也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某种社会-文化思潮影响下形成的具有大致相同的美学倾向、创作方法、艺术追求和广泛影响的文学潮流。更具体地说,凝结为哲学、世界观的特定社会文化思潮(其核心是关于人的观念),乃文学思潮产生发展的深层文化逻辑(“文学是人学”);完整、独特的诗学系统,乃文学思潮的理论表达;流派、社团的大量涌现,并往往以运动的形式推进文学的发展,乃文学思潮在作家生态层面的现象显现;新的文本实验和技巧创新,乃文学思潮推进文学创作发展的最终成果展示。笔者如此细致地解说“文学思潮”,意在强调:19世纪欧洲和西方的“文学思潮”通常是在跨国阈限下蔓延的——它们每每由欧洲扩展到美洲乃至东方国家——其内涵既丰富又复杂,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可能

深度理解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思潮所拥有的跨文化、跨民族、跨语种的“世界性”效应及其“世界文学”之特征与意义。事实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文学思潮就是在世界性、国际化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或者说,正是19世纪前后欧洲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的世界性、国际化大趋势,催生了这两大文学思潮并促其流行、蔓延于欧美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在那时的交通与传播媒介条件下,这样的流行与盛行已经足够“世界性”和“国际化”了。因此,这两大文学思潮实际上就是“世界性”“国际化”思潮,其间生成和拥有的文学实际上就是相对的、某种程度的“世界的文学”或者“世界文学”范式。由此而论,著名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的六卷本皇皇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完全可以说是对上述两大“国际化”“世界性”文学思潮的开拓性、总结性的比较研究。这部巨著既是特定时期的断代“欧洲文学史”著作,也是一种类型的“世界文学史”著作,其主要研究理念与方法属于“比较文学”,因此,它也是比较文学的经典之作。

不仅如此,事实上19世纪欧洲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流变,远远超出了欧洲和“西方”国家之地理范畴。随着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的世界性展开,特别是各民族间文化交流、国际交往的普遍展开,与东方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了,并且主要是西方文学向东方国家和民族的传播。当时和稍晚一些时候,国门逐步打开后的中国也深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近现代中国文坛上回荡着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的高亢之声。日本文学则受其影响更早更大。如此说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之世界文学属性与特征是显而易见的,它们的产生、发展与流变,起码称得上是宽泛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存在范式,而笔者则更愿意称其为名副其实的早期的“世界文学”。如果有人认为如此界定“世界文学”,其涵盖面还太狭窄,因而不能称之为“世界文学”的话,那么笔者要说,在一定意义上,“世界文学”之涵盖面是永远无法穷尽的,尤其是,“世界文学”之根本内涵不是数量意义上的民族文学的叠加与汇总,而是其超民族、跨文化、国际性的影响力以及跨时空的

经典性意义。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不正是因为具有了这种影响力和经典性才至今拥有不衰的世界意义吗？

再换一个角度，我们从研究方法上看，马克思、恩格斯在后来的著作中论及19世纪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的时候，其眼光和视界显然也是国际化、世界性的，并不限于单个的民族和国家的。比如，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研究和讨论过的19世纪欧洲作家就多达几十位，其中包括法国的夏多布里昂、雨果、乔治·桑、欧仁·苏、巴尔扎克、左拉、莫泊桑；英国的瓦尔特·司各特、骚塞、拜伦、雪莱、托马斯·卡莱尔、艾略特、狄更斯、萨克雷、哈克奈斯；德国的阿伦特、卡尔·倍克、海涅、弗莱里格拉特、敏娜·考茨基、卡尔·济贝尔、贝尔塔·卡·维尔特；俄国的普希金、赫尔岑、屠格涅夫、莱蒙托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谢德林以及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等。此处，分国别详细列举这些作家，意在说明马克思是在“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视野和语境中研究19世纪文学的，他们的这种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同其研究资本主义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一样是世界性的和全人类的。他们对19世纪欧洲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的阐释，实质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特定历史阶段的“世界文学”的研究和分析；他们由此总结归纳所得出的文学理论，显然属于人类“总体文学”或者“世界文学”的范畴。尤其是，他们关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精辟论断，无可否认地具有世界性、人类性意义。他们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必须有现实关怀和历史呈现，进而拥有真实性品格和社会认识价值；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要遵守“细节真实”原则，等等。这些理论生发于对19世纪欧洲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研究，不仅其研究对象具有国际性，而且研究成果的适用范围更具世界性、人类性和历史超越性，对世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不可磨灭的影响。如果说文学也有“世界市场”的话，那么，马克思、恩格斯从19世纪欧洲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中归纳提炼出来的文学原理，无疑是在世界的和人类的文学“世界市场”中流通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好在，与物质商品的流通不同，文学理论的世界性传播与“流通”几乎不需要有形的“世界

市场”，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理论，亦早已不胫而走、广为传播，并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世界性、国际性影响。

由此而论，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实际上已不仅仅是一种永远在路上的“预言”，也不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愿景，而是已产生和形成的“世界文学”实体存在，或者说是一种可供遵循和参照的“世界文学”经典范式。当然，即使是在19世纪，这种“世界文学”经典存在范式，并不仅仅限于欧洲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如前所述，事实上歌德就是在阅读了中国文学经典之后提出“世界文学”论断的，这意味着中国和东方国家文学经典之国际性影响与传播早已存在。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另外，在上述所说的“世界文学”发展过程中，即便是同一种文学思潮范围内的各民族文学，除了具有某一种文学思潮所共有的文化与审美以及创作方法、技巧的相似性之外，也仍然保留了各民族、国家和地区之文学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比如，就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来说，它首先出现在德国，继之蔓延于法国、英国、俄国、美国乃至东方国家，但是，浪漫主义文学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流行，其特征是同中有异、精彩纷呈的。德国浪漫派留恋中世纪，表现出超验的、形而上的和宗教的特征；法国浪漫派既有宗教情结，又追求自由精神和异国情调；英国浪漫派迷恋大自然，寄情于湖光山色，对现代文明表现出超常的不满与反叛；俄国浪漫派则受西欧浪漫派的影响，表现出对落后封闭的俄国农奴制社会的反抗性；美国的浪漫派则与追寻“美国梦”紧密联系，热衷于歌颂人的力量与人性的自由，表达新兴美利坚民族的自豪感。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在欧美和东方各国产生世界性影响，也同样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多元风格。这说明，世界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民族的、国家的文学之独特性不会被销蚀，而是在互补交流中各显风采，并由此汇成蔚为壮观、多姿多彩的世界文学新格局、新态势。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就19世纪文学思潮的发展演变来看，“世界的文学”的出现也好，“世界文学的时代”之到来也罢，都不仅没有导致民族的和不同质的文学的消失，也没有出现一体化、同质化、整一性的大一统人类文学，而且还孕育

了一种额外的产品：借着19世纪欧洲文学的“世界性”发展，一种研究文学的新方法——“比较文学”应运而生。因为，没有文化的差异性和他者性，就没有可比性；而有了民族的与文化的差异性的存在，就有了异质文学的存在，文学研究者也就可以在“世界文学”的大花园中采集不同的样本，通过跨文化、跨民族的比较研究，去追寻异质文学存在与发展的奥秘，并深化对人类文学规律的研究。因此，正是“世界文学”的出现与形成，以及由此激活了文学研究者对民族文学和文化差异性认识的自觉，文学研究者的比较意识也空前凸显，比较文学也就应运而生。由此我们似乎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证明了为什么“比较文学”兴起于19世纪的欧洲——因为“比较文学”天然地需要以跨民族、跨文化和异质性、他者性为存在的前提条件，比较文学是天然地依存于世界文学的。如此说来，勃兰兑斯可以说是19世纪比较文学领域最有成就的实践者之一。

那么，当人类社会进入了21世纪的“网络化—全球化”时代，物质的、经济的和技术的全球化愈演愈烈，文化交流也快速而深度地展开，“世界文学”又将呈何种形态？它会走向文学的“世界主义”吗？

四 “网络化—全球化”意味着文化“一体化”？

网络助推全球化，我们正处在“网络化—全球化”时代。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全球化插上网络技术的翅膀，其进程越来越快，成为一种难以抗拒的世界潮流，人类的生存已然处在快速全球化的“高速列车”中。然而，全球化在人的不同生存领域，其趋势和影响是不尽相同的，尤其在文化领域更有其复杂性，因此，简单地认定文化也将走向普遍意义上的“全球化”，无疑过于武断和不正确。

当今时代的全球化，首先是在经济领域出现的，从这一层面看，全球化的过程是全球“市场化”的过程；“市场化”的过程又往往是经济规则一体化的过程。“进入8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番结构性的调整和发展。在以高科技和信息技术为龙头的当代科学技术上升到一个新

的台阶之后，商业资本的跨国运作，大型金融财团、企业集团和经贸集团的不断兼并，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不仅使得经济、金融、科技的‘全球化’在物质技术层面成为可能，而且的确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社会现实。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一个联系越来越密切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世界性经贸联合体实行统一的政策目标，各国的税收政策、就业政策等逐步统一化，技术、金融、会计报表、国民统计、环境保护等，也都实行相对的标准。”^②这说明，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经济生活，追求的是经济活动规则的一体化与统一性。所以，由于“全球化”的概念主要或者首先来自于经济领域，而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又以一体化或统一性为追求目标和基本特征，因而，在这种意义上，“全球化”这一概念与生俱来就与“一体化”相关联，或者说它一开始就隐含着“一体化”的意义。

在网络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21世纪，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传媒全球化，由此又必然产生人类价值观念的震荡与重构，这就是文化层面的全球化趋势。因此，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带来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然而，文化的演变虽然受经济的制约，但它的变革方式与发展方向则因其自身的独特性而不至于像经济等物质、技术形态那样呈一体化特征。因此，笼统地讲文化的全球化传播也必然经济全球化那样像趋于“一体化”是不恰当的，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并不是各民族文化的整一化、同质化。在经济大浪潮的冲击下，西方经济强国的文化（主要是美国的）价值理念不同程度地渗透到经济弱国的社会文化机体中，使其本土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后产生变革与重构。从单向渗透的角度看，这是经济强国的文化向经济弱国的文化输入乃至文化扩张，是后者向前者的趋同。然而，文化发展规律之不同于经济发展规律的独特性在于：不同种类、不同质的文化形态的价值与性质并不完全取决于它所依存的经济形态的价值；文化的价值标准不像经济的物质的价值标准那样具有普适性，相反，它具有相对性。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同的文化形态在互渗互补的同时，依然呈现多

元共存的态势，文化的独立性、互补性与多元性是辩证的统一。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经济弱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同样也可能反向渗透到经济强国的文化机体之中，这是文化互渗或文化全球化“趋势”的另一层含义。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逊所言，在文化上，“全球文化的流动经常会给地方文化注入活力。因此，地方差异性和特色并非完全被西方同质性的消费主义力量所淹没，它们在创造璀璨的独特文化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全球化不仅不会导致世界文化的同质化，反之会促进文化上的“全球地方化”^②。所以，在谈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发展演变趋势时，我既不赞同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以“超文化”的姿态，凌驾于其他异质文化的价值体系之上并力图取代一切，谋求“世界主义”的大一统，也不赞同狭隘的文化相对主义、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我认为，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仅仅是“趋势”而已——既不是抹煞异质文化的个性，也不能制造异质文化之间的彼此隔绝，而应当在不同文化形态保持独特个性的同时，对其他文化形态持开放认同的态度，使不同质的文化形态在对话、交流、认同的过程中，在互渗互补与本土化的互动过程中，既关注与重构人类文化的普适性价值理念，体现对人类自身的终极关怀，又尊重并重构各种异质文化的个性，从而创造一种普适性与相对性辩证统一、富有生命力而又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而不是像“世界主义”论者所倡导的“强国文化”的独霸。所以，文化上的“全球化”，或者文化上的世界化、国际化，强调和追求的都是包含相对性的普适文化，是一种既包容了不同文化形态，同时又以人类普遍的、永恒的价值作为理想的人类新文化，是一种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

因此，我认为，21世纪经济、物质、技术领域的全球化，并不至于导致同等意义上的文化的同质化、一体化，而是文化的互渗互补与本土化、地方化的双向互动；换句话说，“网络化—全球化”并不至于使世界走向文化上的“世界主义”，而是普适性与多元化的辩证统一。“世界上‘一体化’的内容可以是经济的、科技的、物质的，但永远不可能是文学的或文化的。”^③这种历史发展趋势，同样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物质生产方式与

精神生产方式发展的不平衡性规律。所以，在严格的意义上，或者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不平衡性规律看，“全球化”可能导致的“一体化”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而文化上的全球化、世界性“趋势”则终究是文化领域和而不同的多元共存。这种文化发展趋势恰恰为“网络化—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提供了存在与发展有利前提，也为“世界文学”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文化基础。由是，比较文学“消亡”论便是无稽之谈。

五 “比较文学”抗拒“世界主义”？

在网络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人类文化无可避免地也将走向变革与重构；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也必将面临变革与重构的境遇，文学的研究也势必遭遇理论、观念与方法之变革与创新的考验。现实的情形是，20世纪90年代以降，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的信息、大众化，把文学逼入了“边缘化”状态，使之失去了先前的轰动与辉煌，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J. 希利斯·米勒曾经提出文学时代的“终结”之说：“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④相应地，他认为：“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地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⑤今天看来，米勒的预言显然言过其实，不过，它也让人们更加关注文学的衰退与沉落以及文学研究的危机与窘迫的事实，文学工作者显然有必要正视文学的这种现实或趋势，在“网络化—全球化”境遇中，谋求文学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的革新。其实，米勒的“文学研究成为过去”也许仅仅是指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成为过去”，而不是所有的文学研究。那么，我们不妨从这种被“成为过去”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出发，努力寻求与拓展文学研究的新理念、新方法，使文学研究尽可能摆脱“传统”的束缚。

既然经济上的全球化不等于文化上的“一体化”，而是和而不同的多元共存，那么，全球化“趋势”下的“世界文学”也必然是多元共存状态下的共同体，而不是大一统的文学上的“世界主

义”；既然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文学是非同质性、非同一性和他者性的多民族文学共生共存的“世界文学”共同体，那么，“世界文学”的研究不仅需要、而且也必然地隐含着一种跨文化、跨文明的和比较的视界与眼光，以及异质的审美与价值评判，于是，比较文学天然地与“世界文学”有依存关系——没有文学的他者性、非同一性、不可通约性和多元性，就没有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显然，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自然地拥有存在的必然性和生命的活力，也是更新文学研究观念与方法的重要途径。

文学的研究应该跳出本土文化的阈限，进而拥有世界的、全球的眼光，这样的呼声如果说以前一直就有，而且不少研究者早已付诸实践，那么，在“网络化—全球化”境遇中，文学研究者对全球意识与世界眼光则更应有一种主动、自觉与深度领悟，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方法也就更值得文学研究者去重视、运用与拓展。比较文学本身就是站在“世界文学”的基点上对文学进行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它与生俱来拥有一种世界的、全球的和人类的眼光与视野，因此，它天然地拒斥文学的“一体化”与“世界主义”，或者说，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本能地抗拒“强势文化对其他文化及其传统”的“强迫性、颠覆性与取代性”，拒斥“经济大国”和“综合实力强国”之文学“一元化”企图及其对他民族文学的强势挤压与取代。正如美国耶鲁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理查德·布劳德海德所言：“比较文学中获得的任何有趣的东西都来自外域思想的交流基于一种真正的开放式的、多边的理解之上，我们将拥有即将到来的交流的最珍贵的变体：如果我们愿意像坚持我们自己的概念是优秀的一样承认外国概念的力量的话，如果我们像乐于教授别人一样地愿意去学习的话。”^{②③}因此，在全球化境遇中，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方法在文学研究中无疑拥有显著的功用和活力，它成全的是多元共存的世界文学，却断然不可能去成全“一体化”的文学的“世界主义”，而是对文学“世界主义”的抗拒。

不仅如此，在全球化的境遇中，比较文学对文化的变革与重构，对促进异质文化间的交流、对话和认同，对推动民族文化的互补与质异文化

的本土化，均有特殊的、积极的作用。因为比较文学之本质属性是文学的跨文化研究，这种研究至少在两种以上异质文化的文学之间展开，因此它可以通过对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学的研究，促进异质文化之间的理解、对话与交流、认同。所以，比较文学不仅以异质文化视野为研究的前提，而且以促进异质文化之间的互认、互补为终极目的，它有助于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使之在互认的基础上达到互渗互补、共生共存，使人类文化处于普适性与多元化的良性生长状态，而不是助长不同文化间的互相倾轧、恶性排斥。就此而论，比较文学必然抗拒文化上的“世界主义”。

也许，正是由于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把文学研究置身于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大视野，既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互补，又促进着“世界文学”的发展与壮大，因而它自然也有可能为文学摆脱“边缘化”助一臂之力。不仅如此，在网络化—全球化境遇中，虽然有人担心甚至预言“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但笔者上文的论说亦已说明：网络化—全球化促进了文学的交流互补因而也促进了世界文学的繁荣，而在世界文学母体里孕育、成长，并在其“生机”中凸显其作用与功能的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无疑为文学研究者拓宽视野，形成新观念、新方法、新思路与新途径成为可能，从而使我们的文学研究获得一种顺应文化变革与重构的机遇。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通过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方法的推广、张扬与卓有成效的实践，我们不仅可以避免并扼制文学的“世界主义”倾向，而且可以推进世界文学走向一种“人类审美共同体”之更高境界。“将各国对待世界文学的方式进行比较研究，我们也可以更好地构建世界文学传统。我们可以避免过分强调几个文学大国……也可以避免向外随意地输出美国式多元主义。”^{②④}

至于“人类审美共同体”的具体内涵和构建途径，那将是笔者另一有待展开的论题，此不赘述。但是，简而言之，她无疑是一种经历了网络化—全球化浪潮之洗礼，摆脱了“世界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以及经济与文化强国的强势性支配与控制，文学与文化的民族化、本土化得以保护与包容，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信仰相对调和、相得益彰、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的新的世界文学境

界。就此而论，“世界文学”以“各民族文学都很繁荣，都创造经典，彼此不断学习，平等、相互依赖而又共同进步的文学盛世为目标”^⑧。在这样的“人类审美共同体”里，中国文学和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定然有自己的声音和“光荣的席位”——正如歌德当年对德国人和德国文学的期许与展望一样。对此，今天中国的文学工作者无疑应该有这种文化自信和能力自信。

最后，我将继续引用大卫·达莫若什的话来结束本文：“如果我们更多地关注世界文学在不同的地方是如何以多样性的方式构建的，那么全球的世界文学研究就会受益匪浅，我们的学术和我们研究的文学也将具有全球视角。”^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项目编号：15ZDB086）的阶段性成果]

①世纪之交，国际学界围绕“世界文学”的概念展开了深入而持久的讨论，可谓是见仁见智，新见纷呈。其中比较有影响的理论家与著作有：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Christogher Prendergast (ed.), *Debating World Literature*, London: Verso, 2004; Pascale Casanova,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 trans. by M. B. Debevoise,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Emily Apter, *The Translation Zone: A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Mads Rosendahl Thomsen, *Mapping World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Canon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Literatures*, New York: Continuum, 2008; David Damrosch (ed.), *World Literature in Theory*, Chichester, 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 2014; Alexander Becroft, *An Ec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Verso, 2015。

②⑨⑩ [美] 大卫·达莫若什：《世界文学有多少美国成分？》，见张建主编：《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39页，第143页，第14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③陈众议：《当前外国文学的若干问题》，《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5年第1期。

④⑪⑫高照成：《“世界文学”：一个乌托邦式文学愿景》，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6年第6期。

⑤根据德国学者海因里希·迪德尔等人的考证，早在1810年，克里斯托弗·马丁·魏兰就已经率先使用了“世界文学”这一术语，更早一些时候，哲学家赫尔德也使用了“世界的文学”这样的说法。

⑥⑦ [德] 爱克曼辑：《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第113页，第113—1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⑧⑩ [德] 歌德：《歌德文集》第10卷，范大灿、安书祉、黄燎宇等译，第410页，第4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⑨ *Goethes Briefe*, Hrsg. von Karl Robert Mandelkow, Bd. 4, Muenchen: Verlag C. H. Beck 1976 Bd. 4, S. 591–592.

⑫⑮⑯ 丁国旗：《祈向“本原”——对歌德“世界文学”的一种解读》，《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

⑬方维规：《何谓世界文学？》，《文艺研究》2017年第1期。

⑭⑰⑱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第35页，第35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⑲ [俄]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满涛译，第18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⑳ David Damrosch, *What is literature?* p. 4.

㉑ Matthias Freise, “Four Perspectives on World Literature: Reader Producer, Text, and System.” (见“思想与方法”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何谓世界文学？颠覆性与普世性之间的张力”会议文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年10月16—17日)。

㉒ [美] 曼弗雷德·B. 斯蒂格：《全球化面面观》，丁兆国译，第77、73页，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㉓ Douwe Fokkema, “World Literature,” in *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 edited by Roland Robertson and Jan Aart Scholt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7, p. 1291.

㉔ 盛宁：《世纪末·“全球化”·文化操守》，《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㉕ 转引自 [美] 曼弗雷德·B. 斯蒂格：《全球化面面观》，丁兆国译，第62页。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㉖⑳ [美] J. 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㉗ [美] 理查德·布劳德海德：《比较文学的全球化》，见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第23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院]

责任编辑：吴子林